

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

■ 江春泽

大家早上好!衷心感谢大家拨冗来参加这个会,谢谢你们的光临和支持。我也感谢我的母校复旦大学泛海书院的约稿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与努力,使我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我还感谢“网易财经”精心组织了这次读书研讨活动,邀集了众多的知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来共同研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个重大命题。这与我写这本《猜想与求证》的初衷是一致的。

我这本书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决策思想的总体反思。

选择从“帕累托猜想”切入是同类研究中的独特角度,我是从数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得到的启示。1992 年,我曾经给人民日报(内刊)写过一篇题为《经济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文章。但当时只是感到,在经济学领域里解决计划与市场问题,其难度有如在数学领域里求证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近些年,我又联想到,既然自然科学界把没有经过证明的理论假设都叫做“猜想”,那么,我们为何不可以把 20 世纪国际知名的意大利大师级社会学与经济学家帕累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假设命名为“帕累托猜想”呢?

顺着这个思路思考,我认为:
首先,帕累托是在 1902 年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社会主义制度》两卷集中明确提出他的假设的。即:假设一个“社会主义生产部”,由它实行经济计划,并在“理论上”达到恰好与市场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结果。他自己认为,这个假设是“会得到证明的”。

其次,帕累托的假设,在西方学术界曾经引起过正反两方面激烈的、持续的辩论,辩论双方都是当时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领军人物。正方有:巴罗内(意大利)、泰勒(美国)、兰格(美籍波兰人);反方有:米赛斯、哈耶克、罗宾斯等。这场大论战后来流传到苏联东欧国家,形成了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受到主流经济学派的不间断的批判。

第三,这个著名的假设,难道不需要有个求证的结果吗?

于是,我就以《猜想与求证》为题,想写一

本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源配置方式求证的过程与结果。恰好,邓小平 1992 年的公开宣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从实践的角度对“帕累托猜想”得出的反证。

本来,我以为,这个命题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已经取得了共识,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但直到近日,《社会科学报》刊载了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资源配置的两个层次和政府市场的双重作用》。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决定资源配置的就不是市场价值规律,而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等等。尽管我个人对这位老经济学家非常尊重,但他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我不能苟同,我认为这个命题现在还有展开讨论的必要。下面我结合《猜想与求证》这本书的内容,谈一些看法,向大家请教。

第一,计划和市场,究竟哪个是第一性的?

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重新阐明了一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那就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只有客观存在的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政府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再高明,如果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存在,或不发挥“决定作用”,那么,“看得见的手”只能是瞎计划、乱指挥,按某些人的主观意志来对资源误配置。这是中央计划经济以 60 年的昂贵代价换来的惨痛教训。1990 年,我在国家体改委以国外司的名义召开过一个苏联东欧国家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比较研究的讨论会,请来的大多是长期驻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线记者、外交官以及长期做有关这些国家经济研究的学者,他们都列举了大量亲历的事实说明,这些国家的市场极度不发育,市场供求与竞争的规律无从表现。苏联有一种面包 13 戈比一公斤,是列宁



时期定的价,面包上打着钢印,几十年如一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埃尔曼教授说,他在莫斯科大学进修几年,了解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计划工作和长远规划远没有苏联那样细致、复杂和重要,中国制定计划的技术也落后于苏联,中国合格的计划统计工作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比苏联要少得多,投入——产出法、线性规划的应用以及全国自动化管理系统均无法和苏联相比。可是,苏联这样精深细致的计划工作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导向和决定作用下,经济效果甚差,日用消费却长期短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 60 年代起递减,直到 1990 年开创了战后负增长的先河,1991 年又一月不如一月。据当时媒体报道,统计公报的经济综合数字“令人目瞪口呆,没有一个光明点”。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混乱,经济、民族、社会、政治四大危机全面爆发,导致整个社会濒临“爆炸性的边缘”。1990 年 4 月 20 日,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在电视讲话中承认:“现在面临的已经不是有人生活得好与有人生活得糟的问题,而是真正威胁到国家存亡的问题”。这就是在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发挥决定性作用、实行了 60 年精细计划

经济的苏联解体前夕的形势。

记得在上世纪 90 年代,有位中央领导人问:“苏联的渐进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我想,答案应当是:没有明确地提出“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个改革目标。苏联从 1957 年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改革,动因都是从直观上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决策权力过分集中,因此,改革几乎都是从行政性分权入手,赫鲁晓夫是把部门行政分权改为地区行政分权,结果是没有去除弊病,反而加剧了地方主义,增加了混乱。从 1965 年开始的勃列日涅夫时期长达 18 年的改革,也是在不动摇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适当扩大企业权限,加强企业的物质刺激。但占工农业总产值 80%-90%的产品由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95%以上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拨,83%的企业利润由国家直接或间接分配。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要求企业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只是徒具形式的一句空话,与此同时,在理论上,对“市场社会主义”开展不间断的批判。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尽管他在政治上搞了很多开放,但在经济上对“市场经济”却依然讳莫如深,他强调“计划仍是配置资源的主

要的、基础的方式”。1985 年我在美国参加戈尔巴乔夫执政一年的苏联经济研讨会,当时,美国著名的东欧经济专家休·一特说:“苏联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都是从‘嘴巴’开始,中国是解决‘吃饭’问题,苏联是解决‘说话’问题。我看,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赶不上年老的邓小平。苏联人的‘嘴巴’可以随便说话了,但填不饱肚子,这样的改革能持久吗?”果然,他言中了。当然,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长期实行排斥市场经济的僵化体制,经济走下坡路,人民没有丰盛的盘中餐,“填不饱肚子”,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1999 年,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分析苏联走向衰落的原因时指出:这是“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在收割那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苦果,也有精神上的苦果。”当前的乌克兰问题,从深层次来说,也还是那时留下的苦果。

第二,苏联在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唯一的选择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主流经济学界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这个教条使我们把“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奉为经典。这是“市场经济恐惧症”和对计划经济顶礼膜拜的理论认识根源。正是“市场经济恐惧症”和对计划经济的顶礼膜拜,阻碍着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改革明确地向市场经济转型。正因为没有明确的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目标,才使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自 1950 年代以来此起彼伏的改革浪潮始终在行政性分权的怪圈中转悠,一直不能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自然也就没有源于竞争、创新的经济效率。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已经逐步地局部地突破了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但是,直到 1990 年代,“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个框框仍然禁锢着不少人的头脑,意识形态领域的“姓社”与“姓资”争论不断,干扰着改革实践的进展。

(下转 02 版)



■ 李松龄 湖南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宋养琰先生于 2014 年 5 月 17 日在《经济学家周报》上发文,就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出困境的问题阐述了他的想法和意见。其实,他是在期盼更多的经济学者敢于担当历史重任,探讨和建立中国的经济学。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学应该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但又不能把它当作“封闭的、一成不变的、绝对的、最高的和最后的真理”(摘自经济学家周报 2014 年 5 月 17 日的《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出困境》)。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中国经济学要走出困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其一,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做出拓展性的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也是传统经济学家用以批判和排斥西方经济学的工具。如果依据宋先生要重视对生产力及其发展规律研究的认识的话,那么,就必须汲取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资源优化组合,即生产力的合理配置的有关理论和精华。众所周知的,西方经济学用来研究生产力及其发展规律的价值理论是效用价值论。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它与劳动价值论是完全对立的两种理论。因此,要汲取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源优化组合的生产力理论与精华,面临的最大阻

中国经济学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

力就是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其实,劳动价值论的内涵包括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方面。其中,价值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理论工具,价值关系反映的是商品背后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价值理论是研究人与人关系的理论;使用价值是研究生产力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工具,它是一种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的理论。从效用价值论的定义就可以看出它是用来研究人和物的关系的理论。传统经济学家把价值与效用价值对立起来,一是因为研究的对象不一样,二是因为概念的内涵不相同,二者不具有可比性,将二者对立的依据不足。倒是使用价值因为是指物的有用性,体现的是人对物的有用性的感知,研究的是人和物的关系,同效用价值倒有概念上的相似之处,而且研究对象也完全相同。从这种意义上说,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就不是对立,而是一种可以统一的关系。建立在效用价值理论基础上的生产力及发展规律,同样可以建立在使用价值的理论基础之上。不过,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扬弃对使用价值的传统认识。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这个概念是完全正确的。但把使用价值视为商品体,把对实物的度量结果作为使用价值多少的认识,进而把使用价值看作客观存在,并同效用价值的唯心主义对立起来,这种认识就不一定是完全合理的了。物的有用性是人对物的感知,既有生理上的需要,也有心理上的需求,能说物的有用性没有唯心的一面吗?况且,心理上的需要往往是通过生理上的反映而得到满足的,人对美的心理上的需要其实就是通过眼的感觉而得以实现的。既然物的使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那么,使用价值就有随物的稀少性而边际递增,随物的丰裕性而边际递减的特征了。我认为这种认识不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而是一种可以肯定的扬弃。正是因为这种扬弃,我们就可以运用发展了的使用价值理论,对生产力及其发展规律作出有益的探索;同时,也能运用价值理论对生产关系进行探究,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所望尘莫及。

其二,必须运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理论

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进行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似乎缺乏后者那样的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安排,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必须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质财富可以极大丰富,从而能够满足人们各尽所需,因此,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经济总有一天会被取消。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了物质极大丰富的那一天就不复存在了。实际上,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可以是重复劳动,也可以是创新劳动。如果说重复劳动生产的使用价值有可能满足人们各尽所需的话,创新劳动生产的使用价值就不那么尽然了。人类的创新劳动是不会停止的,创新劳动生产的使用价值是不可能各尽所需的,商品交换从而是必要的。因为创新劳动的长期存在,商品经济也就必然长期存在。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安排,必须运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理论对市场配置资源的问题作出分析和研究。西方经济学运用效用价值理论和生产成本理论推导出了消费资料的有效配置——消费者均衡和生产资料的有效配置——生产者均衡。我们也可以运用拓展了的使用价值理论和价值理论推导出消费资料的有效配置——消费者均衡和生产资料的有效配置——生产者均衡。

其三,必须运用拓展了劳动价值理论揭示劳动者工资和资本利润的来源。劳动者工资和资本利润历来被认为是完全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关系。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商品价值除了转移价值之外,就是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其中,劳动力价值转化为劳动者工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利润,劳动者工资多一点,资本利润就会少一点,二者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工资和资本利润是由市场决定的。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是以劳动力价值为依据向劳动力使用者提出供给价格;劳动力使用者是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能够创造的价

值为依据提出需求价格。在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价格即工资比需求价格低,而比供给价格高。所以,劳动者获得的工资通常比劳动力价值要高,劳动力使用者则获得了需求价格高出工资部分的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利润。确如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工资高一点资本利润就会少一点,二者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如果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劳动力的需求价格、供给价格和交换价格一致,工资就和劳动力需求价格相等了,劳动力的使用创造的价值等于市场工资,等于劳动力价值,没有增量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利润。处于劳动力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似乎无对立的理由可言。如果劳动力市场均衡、商品市场非均衡,资本所有者虽然得不到剩余价值转化的资本利润,却能获得商品价格高于价值的利润。这是因为在非均衡的商品市场上,商品的交换价格高于供给价格(以其生产价格或价值为依据),低于需求价格,价格高出价值的部分转化为资本利润。如果两种市场同时均衡,交换价格与供给价格、需求价格一致,也就没有价格高出价值的部分转化为资本利润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是非均衡的,资本所有者不仅能够获得剩余价值转化的资本利润,也能获得商品价格高出价值部分转化的资本利润。如果两种市场同时均衡,两种形式的资本利润就不存在了。两种市场的均衡程度越高,两种形式的资本利润就越少。认识了这一点,工资与利润就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就不仅能够解释不完善、非均衡资本主义市场的资本剥削劳动的历史与现实,也能解释完善和均衡程度不断提高的资本主义市场资本与劳动和谐程度提高的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缓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治本的办法是不断地完善市场和提高市场的均衡程度。

其四,必须运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我们知道,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如果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私有者只是通过

占有剩余价值而获得资本利润,那么生产关系就不可能是和谐的。事实上,如果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程度很高,或是能够实现均衡,商品市场因为资本的增加使用或者创新使用而不均衡,那么,生产资料所有者获得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资本利润就会较少,或者没有,而获得价格背离价值部分转化的资本利润就有可能较多。所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占有的剩余价值转化形式的资本利润,虽然不能像生产资料公有制那样通过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但可以通过完善市场和提高市场的均衡程度而得以逐步减少或者消除。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在一定的市场条件下,不会因为利润的归属不同而相互对立,二者可以实现有条件的和谐。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国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有理论依据的。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剥削和罪恶的根源,是被消灭的对象。现在,因为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不仅不是被消灭的对象,而且倡导大力发展。因此,只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也就必然长期存在。运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理论能够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不是完全对立,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也就揭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必然长期存在的道理。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能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能够得到认同,那么中国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就有可能得以形成。拓展了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背景;拓展了的使用价值理论和市场配置资源理论的有机结合是生产力及其发展规律研究的基础;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的对立统一关系能够揭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不过,在我国理论观念上的认同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只要能够认同上述道理,中国经济学其实是不难建立起来的。